

- 17 《太子太保魏謩碑》，書於咸通五年(八六四年)，柳氏八十七歲。
- 18 《大鑑禪師碑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19 《德宗女憲穆公主碑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0 《大中寺題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1 《靈巖寺題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2 《空寂寺題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3 《砥柱銘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4 《華山燈記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5 《尊勝陀羅尼經咒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6 《泥甚帖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7 《張蘭亭詩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- 28 《嘗瓜帖》，書寫年月不明。

從上述文獻記載中，宋趙明誠《金石錄》收錄柳書計有五十一件、歐陽修《集古錄》計十件（和《金石錄》著錄有九件是相同）、尹一梅主編·宋拓善本懋勤殿本《淳化閣帖·歷代名臣法帖第四》上冊收錄計有四件、清卞永譽纂輯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計十八件；未見宋《金石錄》、《淳化閣帖》、清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著錄的作品有二十八件，合上所述柳氏書作總計一〇二件。吳鴻清先生的《中國書法全集(27)·隋唐五代·柳公權》收錄了部分柳公權傳世的書跡，而柳書流傳至今，現時尚存的書跡卻僅二十七件。

## 第二章 柳公權之生平及其時代背景

本章屬於歷史、傳世文獻的研究。先分析柳公權的生平家世、兄弟、交遊以及師友之情況，以掌握其書學著作背景及詩文寫作的相關訊息。另藉由柳公權的人生寫書歷程來觀察其書法風貌與藝術之成就。

### 第一節 生平事蹟

#### 一、生平

後晉劉昫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公權字誠懸」，又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云：「柳公綽字起之，京兆華原人也。」「子仲郢，弟公權、公諒」<sup>1</sup>，柳公綽乃公權胞兄，據此記載，柳公權乃京兆華原(今陝西耀縣)人。

據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云：「祖正禮，邠州士曹參軍，父子溫，丹州刺史。」<sup>2</sup>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伯父子華…池州刺史、檢校金部郎中、修葺清華池

<sup>1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，(北京：中華書局)，2000年3月，頁2929、2932。

<sup>2</sup>同上註，頁2929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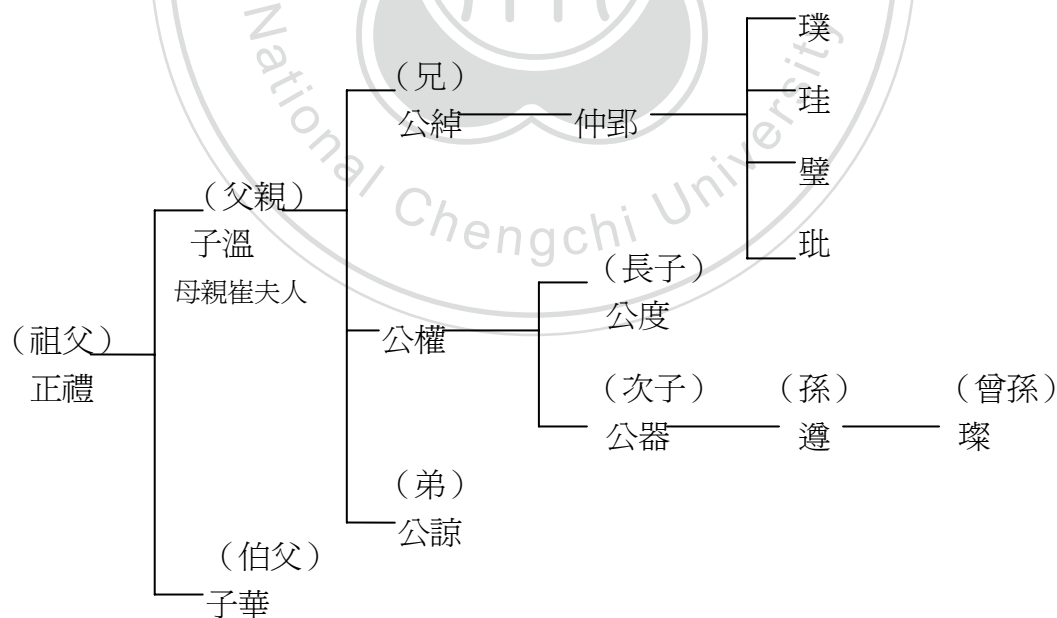
使。」<sup>3</sup>由此可見柳公權之先祖均世代為官，惟自其曾祖以上，史無立傳，無法詳考。其祖父柳正禮曾任邠州土曹參軍，父柳子溫官至丹州刺史，伯父柳子華曾任池州刺史、檢校金部郎中、修葺清華池使，兄柳公綽為兵部尚書。在這樣的世家環境下，柳公權長大後自然也步上了仕途之道。柳公權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官宦家族，自幼便亦受到良好的詩書教育。

新舊唐書均為柳公權立傳，然皆未記其生年，只記其卒年。依後晉劉昫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

「咸通初，改太子少傅，改少師，居三品、二品班三十。六年卒，贈太子太師，時年八十八。」<sup>4</sup>

按咸通為唐懿宗年號，咸通六年即西元八六五年。柳公權享年八十八，則其生年應為西元七七八年，即唐代宗大曆十三年。所以柳公權之生卒年，應是生於唐代宗大曆十三年，前後經歷了李唐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七朝，而卒於唐懿宗咸通六年。柳公權(778--865)，字誠懸，京兆華原(今陝西耀縣)人，所任官職有升有降，最後官至太子太師。

附表一：柳公權世系表



<sup>3</sup>同上註，2000年3月，頁2937。

<sup>4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，(北京：中華書局)，2000年3月，頁2936。

## 二、事蹟

柳公權（西元七七八～八六五年），字誠懸，京兆華原人（今陝西耀縣）人，享年八十八，在中國的書家中，他的壽命活得最長。他是顏真卿書法風格的後繼者，元和初及第進士，歷任翰林院侍書學士等職。他的生長活動期間與中國著名的詩人白居易、元稹、韓愈、柳宗元差不多年代。在他出世後八年懷素去世。（見附表：唐代重要書家年表）。

柳公權出身書香之家，著名文學及書法家柳公綽是他的哥哥。據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幼嗜學，十二能為辭賦」他自幼聰明，愛好書法，十二歲便能工辭賦，名震鄉里。但在科舉考試上並不十分順利，約於唐憲宗元和初年（三十歲）才考中進士。開始只是在祕書省任校書郎。穆宗即位後，聞知他的書法，非常賞識，下令召見他。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穆宗即位，入奏事，帝召見，謂公權曰：『我于佛寺見卿筆跡，思之久矣。』」即日拜右拾遺，充翰林侍書學士，遷右補闕、司封員外郎。」<sup>5</sup> 柳公權當時僅任職位很低的夏州司記官，掌地方文書工作。穆宗召見並當面對他說，早就很想見你了，可見當時柳公權的書法聲名遠播。

當時任命柳公權為右拾遺侍書學士，從地方選拔到翰林院。誰知這個選拔反而影響他的仕途。從此，他一直任侍書學士，先後歷經了穆宗李恆、敬宗李湛、文宗李昂三朝，十多年來默默無聞。柳公權久任侍書學士，既無權勢，亦無地位，又不能藉此升官，難免為時人輕視。一般為官者皆不屑此職務，對這一點，柳公權倒不介意，反而他的哥哥柳公綽對此卻相當不滿意，公綽當時任兵部尚書，在朝野有一定的影響力，因而他就寫信給當時的宰相。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致書于宰相李宗閔云：『家弟苦心辭藝，先朝以侍書見用，頗偕工祝，心實恥之，乞換一散秩。』」<sup>6</sup> 通過這個關係，後來朝廷就任命柳公權為右司中郎、弘文館學士等職。

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云：柳公綽性謹重、遵循禮法。能識別人才，所用僚屬鄭朗，後為名相。元和二年武元衡罷相，充西川節度使，柳公綽為武元衡判官，隨之入蜀。……約於元和四年末五年初入經任吏部郎中。時憲宗頻繁遊獵，柳公綽獻《太醫箴》諫之，深獲嘉獎，元和五年拜為御使中丞。柳公綽素與裴均厚，李吉甫出鎮淮南，深怨均。元和六年李吉甫復執政，即放柳公綽出京，為潭州刺史，兼御史中丞，充湖南觀察使。……大和六年以病代求。三月征還京師，授兵部尚書郎。四月卒，年六十八。贈太子太保，諡曰「成」。<sup>7</sup>

唐文宗開成年間柳公權仍任翰林侍書學士，在宮中侍書，實際地位沒有什麼變化，直到唐懿宗咸通初年他八十二歲高齡，才以太子太保致仕。柳公權的一生

<sup>5</sup> 同上註，頁 2935。

<sup>6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 2935。

<sup>7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，同上註，頁 2929。

雖宦途甚不如意，但由於他潛心書藝，不求聞達，儘管有人爲了爭權奪利、身陷於政治鬥爭之中，但他卻能置身事外，未受衝擊，在幾十年的宦官生涯中未受到波及，可說是難得的爲官歷程。柳公權「志耽書學」，此潛心書藝之歷程，可看出柳公權不求名利、不求聞達的個性。

柳公權生平致力經學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博貫經術，於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莊子》。每說一義，必誦數紙。<sup>8</sup>」此外他還精通音樂，卻不好奏樂。「性曉音律，不好奏樂。常云：『聞樂令人驕怠故也。』」至於他的詩作也有很高的造詣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未央宮苑中，駐輦謂公權曰：『我有一喜事，邊上衣賜，久不及時，今年二月給春衣訖。』公權前奉賀。上曰：『單賀未了，卿可賀我以詩。』宮人迫其口進，公權應聲曰：『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<sup>9</sup>』上悅，激賞久之。<sup>10</sup>」此一段文字是說：有一日他在長安未央宮的御花園中碰到文宗，文宗停了車輦對公權說：「我有一件喜事，邊塞上士兵的衣甲，今年二月分總算發放完畢，了卻我一件心事。」公權即向前道賀，帝曰：「單賀未了，你可用詩來祝賀我。」宮人們也素聞公權才思敏捷，便在旁邊附和，於是公權便應聲成文，賦詩一首：「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」文宗聽後大喜，讚賞不已，命他再賦一首，柳公權「復無停思」，再成一首。「子建七步，爾乃三焉<sup>11</sup>」文宗十分讚賞，他說：「當年曹子建賦詩七步成詩，卿是三步而成。」即刻升他爲諫議大夫、工部侍郎，此詩後來收入《全唐詩》。另外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又記載一事：「武宗嘗怒一宮嬪，久之，既而復召。謂公權曰：『朕怪此人，若得學士一篇，當釋然矣。』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：『不分前時忤主恩，已甘寂寞守長門。今朝卻得君王顧，重入椒房拭淚痕。』上大悅，賜錦綵二百疋，命宮人上前拜謝之。<sup>12</sup>」此段文字亦云有一次武宗曾經爲事遷怒於一個宮嬪，適逢柳公權在場，武宗對柳公權說：「我正責怪這個宮嬪，但若能得到你的一首詩，我即刻放了她。」言罷只見柳公權提起筆，略加思索，頃刻間，揮毫直書便寫成這一首七言絕句。

柳公權的詩意清新婉麗，含蓄深沉。新舊唐書云，他十二歲便能辭賦，合上文所述他，至今他留下的詩作，卻只有五篇，今述如下：

1 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應制賀邊軍支春衣〉<sup>13</sup>：

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

<sup>8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，同上註，頁 2937。

<sup>9</sup>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下冊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應制賀邊軍支春衣〉（台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77年6月，頁 1363。

<sup>10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，同前註 102，頁 2936。

<sup>11</sup>宋歐陽修、宋祁撰《新唐書·柳公權傳》36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 3907。

<sup>12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 2936。

<sup>13</sup>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下冊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應制賀邊軍支春衣〉（台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77年6月，頁 1363。

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公權從幸未央宮苑中，文宗對之曰：『我有一喜事，邊上衣賜，久不及時，今年二月給春衣訖。』公權應聲以詩賀之」。此詩於開成二年作。

〈應制賀邊軍支春衣〉<sup>14</sup>之二

2 挾纊非真纊，分衣是假衣。從今貌武士，不憚戍金微。

言君王的關懷，使士兵感到溫暖。文宗賜衣之恩，使軍隊誓死效忠，使敵人不敢越過阿爾泰山、跨越雷池一步。

3 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應制爲宮嬪詠〉<sup>15</sup>：

《太平廣記》云：武宗嘗怒一宮嬪，久之，既而復召。謂公權曰：朕怪此人，若得學士一篇，當釋然矣。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，大悅，賜錦綵二百疋，命宮人上前拜謝之。<sup>16</sup>

不分前時忤主恩，已甘寂寞守長門。  
今朝卻得君王顧，重入椒房拭淚痕。

有一次武宗曾經爲事遷怒於一個宮嬪，適逢柳公權在場，武宗對柳公權說：「我正責怪這個宮嬪，但若能得到你的一首詩，我即刻放了她。」言罷只見柳公權提起筆，略加思索，頃刻間，揮毫直書便寫成一首七言絕句：「不分前時忤主恩，已甘寂寞守長門。今朝卻得君王顧，重入椒房拭淚痕。」

4 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題朱審寺壁山水畫〉<sup>17</sup>：

朱審偏能視夕嵐，洞邊深墨寫秋潭。  
與君一顧西牆畫，從此看山不向南。

朱審是一位著名的山水畫家，喜愛畫夕陽彩霞之景、池邊之山水風光，無一不是在其筆下畫的栩栩如生。如今能與著名山水畫家朱審一起欣賞名畫，提升藝術欣賞之境界。

<sup>14</sup>同上註，頁 1363。

<sup>15</sup>同上註，頁 1363。

<sup>16</sup>陳貽焮《增訂注釋全唐詩》第三冊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），2001年，頁 828。

<sup>17</sup>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下冊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題朱審寺壁山水畫〉（台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77年6月，頁 1363。

5 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閩門即事〉<sup>18</sup>：

耕夫占募逐樓船，春草青青萬頃田。  
試上吳門看郡郭，清明幾處有新煙。

此言因戰亂衣田荒蕪；古代清明前一日或二日為寒食節，禁火冷食。清明時寒食剛過，正應有新起的炊煙。

另外，還有一次，文宗與諸學士的聯句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。帝曰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』公權續約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』帝獨贊公權兩句，曰：『辭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。』」<sup>19</sup>文宗獨愛柳公權之聯句，馬上命他將聯句題於壁上，每個字約五寸見方。文宗看了他的字後說：「鍾、王復生，無以加焉！」文宗大悅贊為辭清意足，為不可多得的人才。由上可以窺見柳公權詩作之端倪。

中唐以後，唐之盛世日趨下坡，唐憲宗元和十五年以後，宦官專權、牛李黨爭接踵而至，朝政腐敗，穆宗昏庸，馴服於宦官，貪圖奢侈放縱的生活。雖引起朝臣的不滿，但也無可奈何。有一次穆宗問柳公權用筆之法，柳公權回答說「心正則筆正，乃為可法」。其原文見《新唐書·柳公權傳》：「帝問公權用筆法，對曰：『心正則筆正，筆正乃可法矣。』時帝荒縱，故公權及之。帝改容，悟其筆諫也。」<sup>20</sup>面對如此荒縱的皇上，柳公權借談書法而進諫，要他「心正」，正是要他端正朝綱，因此他聽了頗不舒服，乃默然改容生了氣，半晌不作聲。顯然柳公權對當時朝政狀況也極為不滿，但他也只能旁敲側擊，一有機會則規勸之。柳公權敢於皇帝面前，當面諷諫，是當時一些文武大臣所不敢做的，更不敢想像後果會如何，甚至會惹來殺身之禍，但柳公權做到了。因而這段「心正筆正」的故事，自然也就成為膾炙人口「筆諫」的佳話了。這也呈現柳公權忠肝義膽、膽識過人，敢於講真話，不怕得罪權貴的性格，這種耿直的性格確足以為人楷模，更為古代讀書人正氣凜然的表徵。

長慶四年（824），穆宗駕崩，敬宗即位，柳公權旋出翰林院改任起居郎。在起居郎任上沒幾天，公權便偕同諫議大夫獨孤朗等，諫阻淮南節度使王播厚賂求領鹽鐵使。《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一·敬宗本紀》云：「十二月乙亥朔，癸未，……淮南節度使王播厚賂貴要，求領鹽鐵使，諫議大夫獨孤朗、張仲方，起居郎孔敏行、柳公權、宋申錫，補闕韋仁寶、劉敦儒，拾遺李景讓、薛廷老等，伏延英抗疏論之。」<sup>21</sup>。

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又云：「便殿對六學士，上語及漢文恭儉，帝舉袂曰：

<sup>18</sup> 清聖祖御製《全唐詩》下冊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閩門即事〉同上註，頁 1364。

<sup>19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 2935、2937。

<sup>20</sup> 宋歐陽修·宋祁撰《新唐書·柳公權傳》36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 3909。

<sup>21</sup> 楊家駱《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一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），1976年7月，頁 512。

『此澣濯者三矣』。學士皆贊詠帝之儉德，唯公權無言。留而問之，對曰：『人主當進賢良，退不肖，納諫諍，明賞罰。服澣濯之衣，乃小節耳。』…文宗曰：『極之舍不合作諫議』。<sup>22</sup>」有一天文宗和諸學士在殿中閒聊時，談到漢文帝有恭儉的美德，文宗扯到自己的衣服，很得意的說：「我這件衣服已洗過三次了。」言下之意好像講到自己也有儉德之風，諸學士領會皇上之意，便頌揚皇帝的美德，唯獨柳公權絕口不言，文宗就詰問他，柳公權正色答道：「人主應當進賢良、退不肖、納諫諍，至於衣服洗不洗，乃是小節而已。」當時在場的人都被他的言辭給嚇壞了，甚至有人（周墀）為之顫抖。但文宗被他說動了，第二天即升他為諫議大夫。之前的筆諫屬諷諫，而今更是直接當面教訓文宗，可是斗膽敢於冒犯皇上；如果不是柳公權生性耿直、心性無私、看淡名利，很難有此膽量敢說此話了。

宋司馬光《資治通鑑》云：「庚午，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，對曰：『郭昉除邠寧，外間頗以為疑。』上曰：『昉，尚父之侄，太后叔父，在官無過，自金吾作小鎮，外間何尤焉？』對曰：『非謂昉不應為節度使也。聞陛下近取昉二女入宮，有之乎？』上曰：『然，入參太皇太后耳。』公權曰：『外間不知，皆雲昉納女後宮，故得方鎮。』上俯首良久曰：『然則奈何？』對曰：『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，則外議自息矣』。是日，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昉家。上好詩，嘗欲置詩學士。李珣曰：『今之詩人浮薄，無益於理。』乃止。」<sup>23</sup> 這是《資治通鑑》所記載的一段故事。意思是說：有一次唐文宗李昂問工部侍郎柳公權說，近來外間對朝廷的措施，有什麼批評和不滿意的地方？柳公權說：「自從你派郭昉做了邠寧（今陝西邠縣）的主官以後，雖然有些人贊成，但亦有部份人士堅決的反對。」「那為什麼呢？」唐文宗顯得有點不高興，停了一停，又說：「郭昉是尚父的從子，太皇太后的季父，一向做官清廉，沒有過失，如今我放他到邠寧去做一個小小的主官，這難道還有什麼不妥的地方嗎？」柳公權說：「按照郭昉以往對國家朝廷的貢獻和功績來說，放他到邠寧去當主官，原是十分合理合情，無可非議的。只是議論的人說，因為郭昉曾進獻了兩個女兒，才得到這份官位的。」唐文宗於是向他說明郭昉的兩個女兒進獻入宮，僅僅是為了參見太后，並不獻給他做妃子的。可是柳公權說：「瓜田李下的嫌疑，怎麼能夠使家家戶戶每個人都明白呢？」「公權忠言匡益，皆此類也。」<sup>24</sup>」的贊語。

柳公權的書法由於受到帝王的賞識，書作在他生前即已珍貴，深受大家的喜愛。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大中初，轉少師，中謝。宣宗召昇殿，御前書三紙，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，樞密使崔巨源過筆。一紙真書十字，曰：『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』；一紙行書十一字，曰：『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』；一紙草書八字，曰：『謂語助者，焉哉乎也』。賜錦彩瓶盤等銀器，仍令目書謝狀，勿拘真

<sup>22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6。

<sup>23</sup>宋司馬光撰·元胡三省註《資治通鑑》卷二百四十六唐紀六十二（臺北：啓明）1960年，頁1691。

<sup>24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6。

行，帝尤奇惜之。<sup>25</sup>」意思是說：宣宗時，有一次柳公權被召上殿，宣宗命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，樞密使崔巨源遞筆，當場書寫三幅字。一幅是楷書「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」寫的端莊有力。一幅是行書「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」，寫的瀟灑富有神韻。一幅是草書「謂語助者，焉哉乎也」，寫得龍飛鳳舞、渾然天成。宣宗看後大悅，賜以銀彩，又命他自書謝狀，不拘真行，想要留作珍藏賞玩。這便是書法史上有名的「軍容使捧硯，樞密使過筆」。「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，不得公權手筆者，人以為不孝，外夷入貢，皆別署貨貝，曰此購柳書。<sup>26</sup>」當時的柳公權書極負盛名，公卿大臣家有人去世，都要爭取到柳公權寫的墓誌碑版。如果求不到，人們甚至會責罵這家的子孫不孝，即使外夷入貢，也另備金錢來購柳書。因此求他寫碑的人不惜重金，或輾轉相求，使得柳公權一夕間成爲巨富。柳公權的聲名傳播到海外，使的外國人來唐朝時常常需另外準備貨幣或財物，說這是用來專購柳公權書法的。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「銀杯羽化耳」，此云當時公卿貴族贈送的財物金錢有好幾萬，但是常常被家奴盜用，尤其是銀器之類的，但柳公權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若無其事的樣子。有一次問家僕龍安說：「那些東西到哪裡去了？」，龍安回答不知道，柳公權笑著說「銀杯都長翅膀飛走了。」問過後便不再說了，其如此的雅量度量，令世人爲之折服欽佩。

他初學王羲之並精研歐陽詢、顏真卿筆法，然後自成一家。「公權初學王書，遍閱近代筆法，體勢勁媚，自成一家。」所寫楷書，體勢勁媚，骨力勁健。他二十九歲進士及第，在地方擔任一個九品官吏，後來偶然被唐穆宗看見他的筆跡，一時讚爲書法聖品，就被朝廷召到長安，那時，柳公權已四十多歲。他的爲人既有骨氣、一絲不苟，同樣地，他的字也顯露了他這部分的特質。誠懇學習書法自二王入手，其後遍取前代書家之長；其書之樣貌，雖與魯公肥瘦殊異，而筆法實同。博覽衆長，運己意於新體，遂自成一家。一生書法得穆宗、文宗、宣宗三朝之喜愛，當代公卿之家所作碑誌，若未得誠懇書，便有「子孫不孝」之譏。外夷聞其書名，往往以貨貝具購其字，是以名揚中外。

### 三、仕途生涯

憲宗元和初（約八〇八），三十一歲的柳公權進士及第，當年鴻辭登科。從此，柳公權開始了漫長的仕途生涯，竟然歷仕七朝：憲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、懿宗。

在憲宗時，柳公權任秘書省校書郎。《舊唐書》：「元和初，進士擢第，釋褐秘書省校書郎」《舊唐書》：「李聽鎮夏州，辟為掌書記」。李聽與柳有此交誼，故柳晚年還爲其書過碑。

《舊唐書》：穆宗即位，入奏事。帝召見，謂公權曰：「我於佛寺見卿筆跡，思之久矣。」即日拜右拾遺，充翰林侍書學士，遷右補闕，司封員外郎。從此他

<sup>25</sup>同上註，頁 2935、2937。

<sup>26</sup>同上註，頁 2935、2937。



在穆宗、敬宗、文宗三朝，一直侍書禁中。皇帝的寵倖、生活的優裕，並不給柳公權帶來歡樂。他內心卻有無法排遣的苦悶與隱隱的羞愧。他酷愛書法藝術，但他不想以此作為自己全部的生活；建功立業的進取雄心，時時躍動在胸間。而隨從皇帝的侍書，其地位僅與「工祝」一類相等。因此其兄柳公綽曾寫信給宰相李宗閔《舊唐書》：李宗閔云：「家弟苦心辭藝，先朝以侍書見用，頗偕工祝，心實恥之，乞換一散秩。」乃遷右司郎中，累換司封、兵部二郎中，弘文館學士。

唐文宗頗愛柳公權書法，《舊唐書》：文宗思之，復召為侍書，遷諫議大夫，俄改中書舍人，充翰林書詔學士。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，累遷學士承旨。

《舊唐書》：武宗即位，罷內職，授右散騎常侍。宰相崔珙用為集賢學士、判院事。

《舊唐書》：李德裕（宣宗）時，左授大子詹事，改賓客，累遷金紫光祿大夫、上柱國、河東郡開國公。復為左常侍，國子祭酒，歷工部尚書。

《舊唐書》：懿宗時，咸通初年，柳公權改為太子少傅，改少師；在咸通六年（八六五）卒，贈太子太師，時年八十八。<sup>27</sup>

## 第二節 兄弟、交遊

### 一、柳公綽

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云：

「公綽幼聰敏。年十八，應制舉，登賢良方正、直言極諫科，授秘書省校書郎。」、「大和六年，以病代求。三月，授兵部尚書，征還京師。四月卒，贈太子太保，謚曰成。」<sup>28</sup>

柳公綽<sup>29</sup>（七六六~八三二），字起之，柳公權之兄；卒後追贈太子太保。貞元元年（七八五）應制舉，登賢良方正，直言極諫科，受秘書省校書郎。貞元四年復應制舉，再登賢良方正科，授渭南尉。對於他的書法創作影響最大的要屬他的兄長柳公綽，較柳公權大十一歲，官歷諫議大夫、刑部尚書、兵部尚書等官職。柳公綽不但身居高位，而且擅長楷書，他的作品有《諸葛武侯祠堂碑》、《紫陽先生碑》等。

柳公綽之書作，據宋趙明誠《金石錄》<sup>30</sup>卷第九 目錄九記載  
第一千七百七十二，唐《紫陽先生碑》，李白撰，柳公綽正書，寶歷元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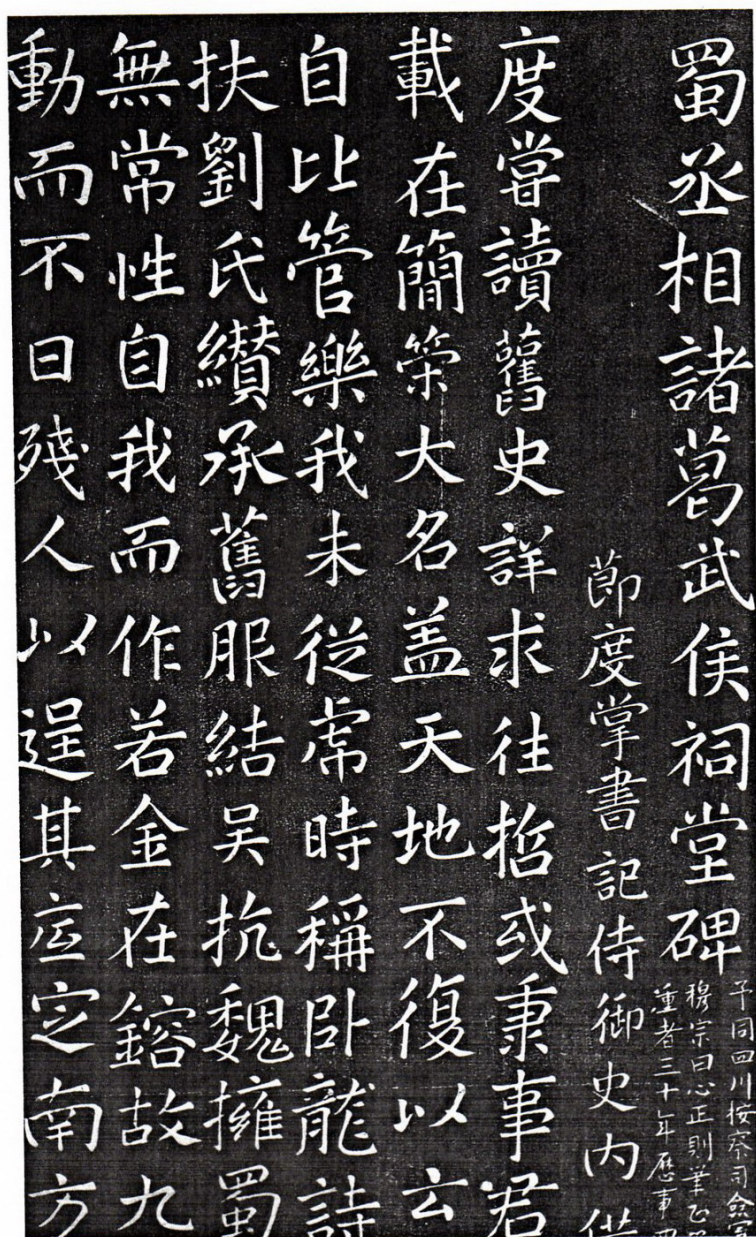
<sup>27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5-2936。

<sup>28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29、2932。

<sup>29</sup>同上註，頁2929。

<sup>30</sup>宋·趙明誠《金石錄》冀淑英精覈整理（北京：中華書局影印），1983年6月，卷九~十。

另有一書作，現存但未見於宋代著錄有《諸葛武侯祠堂碑》：  
元和四年（八〇九）二月書。凡二十四行，行五十字。碑存四川成都武侯祠，北京圖書館藏。《諸葛武侯祠堂碑》是柳公綽隨武元衡入蜀任職時所書。



圖一：柳公綽《諸葛武侯祠堂碑》局部

## 二、柳公諒

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：「弟公權、公諒<sup>31</sup>」柳公諒為柳公權之弟，其生平事蹟為何？文獻皆無記載。

## 三、裴休、沈傳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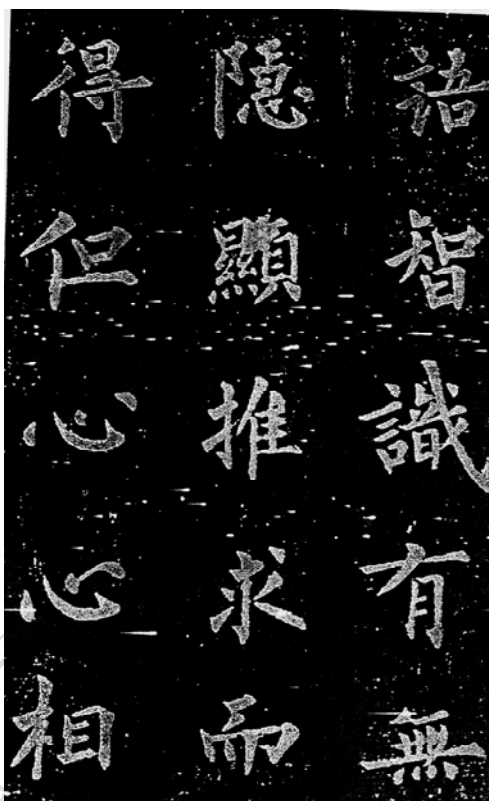
<sup>31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綽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2。

裴休（七九一~八六四），字公美。唐孟州濟源（今河南省濟源縣）人。其父裴肅，貞元年間浙東團練觀察使。原籍河東，自幼學佛，人稱河東大士。官監察御史、兵部侍郎，大中六年（八五二年），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「性寬惠，為官不尚皁察，而吏民畏服」。立稅茶十二法。秉政五年，罷為宣武軍節度使，封河東縣子。歷昭義、河東、鳳翔、荆南四節度。

裴休，宣宗大中六年起位居宰相近四年，於財政方面頗有業績，撰文時任江南西道都團練處置等使，他極熱中佛教，廣交僧侶，深研佛典，並精通教理，堪稱居士長者之流。裴休精於文章，書法亦受柳公權影響自成一家，作品有《圭峰禪師碑》，雖然受柳公權書法濃厚的影響，但書形則與歐陽詢相似，碑由柳公權書寫篆額，與《玄秘塔碑》可窺知兩人的關係匪淺。

裴休家世奉佛，休尤甚，為靈佑禪師奏建密印寺。晚年退居湖南寧鄉瀉山鄉清溪之裴公庵，卒後與夫人陳氏同葬于瀉山，墓園以花崗石及青石砌成，墓葬現為湖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，其子裴文德為狀元出身。著有《勸發菩提心》。蔡明讚《中國書法史新論》云：「裴休所書《圭峰禪師碑》，書風似柳公權，筆畫峻整，結構細密，堪稱傑作。」<sup>32</sup>裴休工文善書，刻意翰墨，真楷適媚。《圭峰禪師碑》楷法極似柳體。休與柳公權交情甚厚。柳公權力作《玄秘塔碑》和開成元年所書《宣武節度使王公神道碑》即由裴休撰文，而裴休的代表作《圭峰禪師碑》即由柳公權篆額，足見其交情之篤厚。再則裴休和柳公權之年紀相差十歲餘，以柳公權的聲望和在書法藝術上的成就，竟能讓其與同時而年長十餘歲（裴休年長），並曾為相的裴休深受浸染。

<sup>32</sup> 蔡明讚，《中國書法史新論》（台北：惠風堂），1992年8月，頁54。



圖二：《圭峰定慧禪師碑》局部

同儕的互相切磋砥礪，取長補短，是進步的重要因素。柳公權的成功，同儕的影響是重要因素之一，如長於柳公權十歲的沈傳師，以及小於公權十三歲的裴休，都被視為與柳公權同一類型的書家，尚清勁爽朗。柳公權的名碑《玄秘塔》即是裴休撰文，裴休的名碑《圭峰定慧禪師碑》即由柳公權篆額。可見柳書的影響，其運筆之操縱，結體之疏密，和沈傳師、裴休、柳公權之兄柳公綽也精書法，相互影響也在情理之中。

上面簡述唐代書法風尚的遞嬗，下則探討柳公權書藝創作的各項背景，茲分述政治背景、經濟背景、社會背景及學術背景四部分，加以分述：

### 第三節 時代背景

初唐書法，一般而論，多受兩方面影響較大，一是王羲之、王獻之父子，一是隋碑。這兩路書法面貌大致以瘦硬為主，杜甫有詩云：「書貴瘦硬方通神。<sup>33</sup>」然至盛、中唐以後，書風則開始走向尚肥，其他藝術作品如繪畫、塑像等亦有這些變化，甚至連美女也以豐腴為美，如玄宗貴妃楊玉環即為當時代表。初唐的塑像往往比較清瘦，盛、中唐以後則轉向肥碩。其次帝王提倡也使下面聞風響應，如唐太宗學「二王」，天下人崇秀潤瘦硬之字。到唐玄宗則發生了變化，皇帝本

<sup>33</sup> 清聖祖御製，《全唐詩》上冊卷二百二十二·杜甫七〈李潮八分小篆歌〉（台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77年6月，頁591。

人喜歡肥字，從他傳世的作品看，他的書法已不同於初唐面目，而是逐漸趨於肥美。顏真卿的書法正產生於這一時期，他的字打破了「二王」藩籬，以拙為巧，以肥為美，將楷書寫得敦厚圓滿，其後期成熟的作品亦然。但正因為顏的楷書達於極致，也限制和影響了其他風格的發展，尤其不善學顏書的，易流於肥俗惡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有創新精神又不願寄古籬下的書法家往往思變化而自創一格，所以中唐末柳公權、沈傳師等人便開始專主瘦硬以矯肥厚之失，其中又以柳公權成就最為突出。

### 一 帝王的重視

唐代帝王對書法的偏愛、酷愛書法的程度，可說是歷代所未見的。唐代帝王，太宗好尚書法，尤其特別珍視王羲之書法，曾親筆為王羲之作《傳論》，讚揚王羲之，並云：

「詳察古今，研精篆素，盡善盡美，其惟王逸少乎！」<sup>34</sup>。

太宗之貞觀，玄宗之開元、天寶，皆唐之盛世，兩帝提倡書風不遺餘力，其中尤以太宗影響書學最鉅。對書法的喜愛程度自不用說了。一個君王對一位書家推崇程度之高，是極罕見的。且當時又設有書學一科，清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云：「唐立書學博士，以身、言、書、判選士，故善書者眾。」<sup>35</sup>。唐寶胤《述書賦》云：

「我巨唐之膺休，一六合而闡幽。武功定，文武修，高祖運龍爪，陳睿謀。自武雄其神貌，冠梁代之徽猷。」<sup>36</sup>

唐代君王大多能書，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，故唐代書家之眾，為歷代之冠。書法深為皇帝所欣賞，如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

「公權字誠懸。幼嗜學，十二能為辭賦。元和初，進士擢第，釋謁秘書省校書郎。李聽鎮夏川，辟為掌書記。穆宗即位，入奏事，帝召見，謂公權曰：我於佛寺見卿筆蹟，思之久矣。即日拜右拾遺，充翰林侍書學士，遷右補闕、司封員外郎。」<sup>37</sup>

除了太宗以外，其帝王亦不乏愛好書法者。如高宗李治、中宗李顯、睿宗李旦、

<sup>34</sup> 李世民，《王羲之傳論》，見華正人編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），1984年9月，頁109。

<sup>35</sup> 清康有為，《廣藝舟雙楫》，見華正人編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年9月，頁801。

<sup>36</sup> 唐寶胤，《述書賦》，見華正人編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），1984年9月，頁230。

<sup>37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5。

玄宗李隆基、肅宗李亨、代宗李豫、以至德宗李適、憲宗李恆等幾乎所有的唐代帝王都傾情於書法，都有善書好書之名。在時勢潮流的推波助瀾，上行下效，群臣競相投其所好，這也就是唐代楷書得以高度發展、興盛之原因。

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云：

「每浴堂召對，繼燭見跋，語猶未盡，不欲取燭，宮人以蠟淚揉紙繼之。（開成二年）從幸未央宮苑中，駐輦謂公權曰：『我有一喜事，邊上衣賜，久不及時，今年二月給春衣訖。』公權前奉賀。上曰：『單賀未了，卿可賀我以詩。』宮人迫其口進，公權應聲曰：『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<sup>38</sup>』上悅，激賞久之。文宗夏日與學士聯句。帝曰：『人皆苦炎熱，我愛夏日長。』公權續約：『薰風自南來，殿閣生微涼。』時丁、袁五學士皆屬繼，帝獨贊公權兩句，曰：『辭清意足，不可多得。』乃令公權題於殿壁，字方圓五寸，帝視之，嘆曰：『鍾、王復生，無以加焉！』<sup>39</sup>」

此云當有時夜晚燭窮而語未盡，宮人只好以蠟液濡紙，繼續點燃燭火。有一天，他在長安未央宮的御花園中碰到文宗，文宗就停了車輦對公權說：「我有一件喜事，邊塞上士兵的衣甲，今年二月分總算發放完畢，了卻我一件心事。」公權即向前道賀，帝曰：「單賀未了，你可用詩來祝賀我。」宮人們也素聞公權才思敏捷，便在旁邊附和，於是公權便應聲成文，賦詩一首：「去歲雖無戰，今年未得歸。皇恩何以報，春日得春衣。」文宗聽後大喜，讚賞不已，命他再賦一首，柳公權「復無停思」，再成一首。並請柳公權書于殿壁上，文宗十分讚賞，他說：「鍾王復生亦不能以之媲美。」即升他為諫議大夫、工部侍郎，可見其書法之美，風靡於當時。柳公權的書法、文詞常給文宗帶來些許的快樂，受到文宗的恩寵也是自然的事了。

大中初，轉少師，中謝。宣宗召昇殿，御前書三紙，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，樞密使崔巨源過筆。一紙真書十字，曰：「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」；一紙行書十一字，曰：「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」；一紙草書八字，曰：「謂語助者，焉哉乎也」。賜錦彩瓶盤等銀器，仍令日書謝狀，勿拘真行，帝尤奇惜之。<sup>40</sup>

柳公權的書法由於受到帝王的賞識，書作在他生前即已珍貴，深受大家的喜愛。此云宣宗時，有一次柳公權被召上殿，宣宗命軍容使西門季玄捧硯，樞密使

<sup>38</sup> 清聖祖御製，《全唐詩》下冊卷四百七十九·柳公權〈應制賀邊軍支春衣〉（台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77年6月，頁1363。

<sup>39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5、2937。

<sup>40</sup> 同上註，頁2935、2937。

崔巨源遞筆，當場書寫三幅字。一幅是楷書「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」寫的端莊有力。一幅是行書「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」寫的瀟灑富有神韻。一幅是草書「謂語助者，焉哉乎也」寫得龍飛鳳舞渾然天成。宣宗看後大悅，賜以銀彩，又命他自書謝狀，不拘真行，想要留作珍藏賞玩。這便是書法史上有名的「軍容使捧硯，樞密使過筆」的文人雅事。清梁巘《評書帖》云：「虞、歐、顏、柳、褚、李、徐、薛八家，唐人第一等書。」「虞、褚、李、顏、柳諸家，行楷妙。<sup>41</sup>」可見柳公權楷行草在當時即已受到大家的喜愛。

## 二 經濟背景

唐代開國以後，社會安定，經濟上有很大的進展。《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二·食貨志》云：「貞觀初…米斗四五錢，外戶不閉者數月，馬牛被野，人行數千里不齎糧，民物蕃息…<sup>42</sup>」加上科舉制度之推行，故文風極盛，統治者又鼓勵官僚子弟學習書法，於是書法盛興一時，尤其是楷書的技法。

唐代用楷書來寫碑記、墓誌銘、頌讚、告敕、官闕銘和種種題額等，是相當流行的，蔚然成風。「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，不得公權手筆者，人以為不孝，外夷入貢，皆別署貨貝，曰此購柳書。<sup>43</sup>」柳公權書享譽海外，連國外史者都署名要購買柳公權的書法，甚至不惜重金購買，或輾轉取得，國內的公卿大臣家有人去世，都要爭取到柳公權寫的墓誌碑版。如果求不到人們甚至會責罵這家的子孫不孝，即使外夷入貢，也另備金錢來購柳書。這既可說是實用的需要，又可說成是當時欣賞雅習書法之風盛行。也帶動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繁榮。繁榮的經濟對文學藝術的影響是相輔相成的。唐代經濟的發達已有眾多的史書記述，經濟的繁榮往往可給文化藝術的繁榮提供強而有力的物質基礎。它主要表現在為士人的文化自信心裡提供有力的背景和支柱，激發了士子們昂揚向上的蓬勃生氣。此一風氣刺激著唐代各類藝術的發展，如舞蹈、音樂、詩歌、散文、書畫、建築、雕塑的發展。藝術與藝術之間濃烈的風氣競相進取、相互影響，又促進著各類藝術的再進步。傑出的詩人詩仙李白、詩聖杜甫等人對書法的讚賞，書家對舞蹈家的學習借鑑，畫家向書家學習書法，以提高繪畫境界等等，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推動了各類書法藝術之發展。

## 三 社會影響

雖然楷真書在曹魏時已然形成，自晉至隋都在逐漸成長；但真正成熟發展卻是在唐代。唐代的正楷猶如唐代的國勢一樣，出現了空前興盛的局面，書體成熟，書家輩出。自唐代楷真書成熟以後，再無一種性質，分量相當於篆隸草真書的書

<sup>41</sup> 清梁巘《評書帖》參見華正人編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），1984年9月，頁542。

<sup>42</sup> 楊家駱主編，《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二·食貨志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），1976年7月，頁1344。

<sup>43</sup> 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柳公權傳》卷一百六十五列傳第一百一十五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2935、2937。

體繼續出現。直至現在我們的文字，所應用的標準書體，還是唐代形成的楷書。而在書法藝術方面楷書也是主要的一種。唐代書法當然是繼承隋代而來，尤其唐初的幾位大家：歐陽詢、虞世南都是生於陳時，在隋代書名已經很高了。褚遂良生於隋開皇間，也是由隋入唐的人物。

佛教傳入中國後，由於佛經弘布流通的需要，於是與中國傳統書寫方式的書法結合，因而書法家受到佛法的薰陶，常以佛教為題材來豐富書法的內容，使得中國的書法藝術更增意趣與內涵。歷代著名的文人士子，多以抄寫佛經提昇自我的修養，如王羲之、柳公權、顏真卿、蘇東坡、趙子昂等人，都有關於佛教的書帖作品行世。佛教的僧侶中，也不乏精通書法者。如南北朝的智永禪師，創作真草「千字文」、「永字八法」，不僅統一各家草書，也被後代書法家奉為典範。

唐代初期佛教興盛，一時效法六朝，寫經隨之而盛，從朝廷到民間都出現了眾多的寫經好手，也推動著楷書的發展。寫經和抄經對書法藝術保存的文獻有：柳公權《金剛般若經》、《清淨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玄祕塔碑》<sup>44</sup>。另外從初唐起，皇帝身邊就有侍書者，即所謂的高級書法顧問。像是虞世南死後，太宗嘗嘆曰：虞世南死，無與論書者！後經魏徵引薦褚遂良，帝令侍書。到穆宗時起，柳公權曾三任侍書學士。因而常有著名書家就任此職。

百花齊放的唐代，亦是中國文學史的高峰。唐代大文學家們對書法藝術的關注，也促使書學風氣更為光輝燦爛。他們不僅本身以善書知名，更以詩著名，如李白、杜甫、王維、韓愈、柳宗元、杜牧、李商隱等。而且以詩、文等文學樣式歌詠、評論書法，使得當時之書法蔚為風氣，開闢書法廣闊之天地。杜甫有詩云：「書貴瘦硬方通神。<sup>45</sup>」。

書法在魏晉南北朝隋唐為極盛時期，在此期間亦正當佛法興盛的時候。佛法自東漢傳入以後，從魏晉開始，佛法更與書法藝術意趣相投。書法藝術極盛的原因，跟佛事的開展、活動有著極密切的關係，書法藝術的保存與傳播，亦因佛事的開展、活動而得以傳播與提升，兩者是相輔相成、齊頭並進的。劉有定《衍極注》云：「釋懷素聞於鄔彤，柳公權亦得之，其流實出於永師也。<sup>46</sup>」柳公權亦和佛法禪宗有師承淵源。

以下就佛法和柳公權之書作有關者，臚列於下：

(一) 寫經和抄經對書法藝術保存的文獻有：

柳公權《金剛般若經》、《清淨經》、《心經》、《金剛經》<sup>47</sup>。

(二) 書寫佛寺的碑銘者，如：

柳公權《大達法師玄祕塔碑》<sup>48</sup>

(三) 書寫僧侶傳法事蹟，如：

<sup>44</sup> 田光烈，《佛法與書法》（台北：頂淵文化事業），1993年3月，頁19。

<sup>45</sup> 清聖祖御製，《全唐詩》上冊卷二百二十二·杜甫七〈李潮八分小篆歌〉（台北：宏業書局有限公司），1977年6月，頁591。

<sup>46</sup> 劉有定《衍極注》參見華正人編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年9月，頁402。

<sup>47</sup> 田光烈《佛法與書法》（台北：頂淵文化事業），1993年3月，頁19。

<sup>48</sup> 同上註，頁149。



柳公權《圭峰定慧禪師傳法碑》<sup>49</sup>，裴休撰並正書，柳公權篆額。

#### 四 學術文化

##### (一) 科舉取士對書法的影響

清康有為《廣藝舟雙楫》云：「唐立書學博士，以身、言、書、判選士，故善書者眾。<sup>50</sup>」唐代統治者對書法的愛好，也反映到科舉上。唐翰林院有侍書學士，國子監有書學博士，科舉上有書學科，吏部以書判定，書法亦為進身途徑之一，故唐人學書者多。考中進士在當時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資格，要取得官職還要經過吏部的選試。標準是四項：身、言、書、判，對書的要求是「楷法逾美」。這一點對士子們進身朝政特別重要，可以說是寫得一手漂亮的楷書，正是他們進身仕途的敲門磚。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云：

凡擇人之法有四：一曰身，謂體貌豐偉；二曰言，言詞辯正；三曰書，楷法逾美；四曰判，文理優長。四體皆可取，則先德行；德均以才，才均以勞。得者為留，不得者為放。五品以上不試，上其名中書門下；六品已下始集而試，觀其書、判。已試而銓，察其身、言。<sup>51</sup>

唐代的科舉發達，明文將「以書取士」納入制度，唐代士子在經歷鄉試、省試之後，才能參加吏部的銓選。

##### (二) 開設書法學校與推展書法教育

書法學校的設立。中國書史上置書學博士始於晉代，設立專門的書法學校始於唐代。唐朝的學校共有六種：國子學、太學、四門學、律學、書學、算學。書學為專科學校；而弘文館是唐代貴族子弟學習書法的地方，也招有學書的學生。書法學校系統的學書訓練，無疑造就了無數的書法家。除了在專門學校裡學習外，還有進行書法教育的其他多種形式。如在其他學校學習儒經，學生也須「學書二日紙一幅」。《舊唐書·職官二》云：

弘文館學掌詳正圖籍，教授圖籍。凡朝廷有制度沿革，禮儀輕重，得參議焉。校書郎掌校理典籍，刊正錯謬。其學生教授考試，如國子學之制焉。<sup>52</sup>

弘文館隸屬於門下省，在太宗時具有很大的作用：一則詳正圖籍並教授學生，再則與皇帝討論政事，三則學士在此傳授楷法，故弘文館為初唐法制建立的重要機構。《舊唐書·職官三》云：

書學博士，學生三十人。博士掌教文武百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為生者。以《說文》、《石經》、《字林》為專業，餘字書兼習之。<sup>53</sup>

<sup>49</sup>同上註，頁 151。

<sup>50</sup>清康有為，《廣藝舟雙楫》參見華正人編《歷代書法論文選》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 年 9 月，頁 801。

<sup>51</sup>宋歐陽修、宋祁撰《新唐書·選舉志》45 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1997 年 3 月，頁 1174-1175。

<sup>52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職官二》卷 43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1997 年 3 月，頁 1847-1848。

相較於弘文館所收習隸書者為五品以上，隸屬於國子監的書學，是屬於初級書法教師。以《說文》、《石經》、《字林》為專業，建立文字基礎。顯而易見的，唐人書法中對古文、篆隸的重視。

### （三）儒釋道學的影響

唐代書家為什麼不遺餘力地把書法之「法」推向無可復現的高峰？為什麼能在歷史上第一次統合南北書風？這固然主要是因為一種奮發向上的時代精神的催化，同時我們又無法忽視儒學精神在唐代楷書大師身上的滲透。居於中國傳統文化主導地位的儒學，倡導文質統一的審美觀。儒家美學從來不把善獨立於美之外，而追求盡善盡美的審美理想，要求個體內在的情感愉快與內在的社會倫理道德相和諧，這就要求書家在進行藝術建構的同時要符合社會規範，最好也能為社會提供新的規範與秩序。這對當時統治者尤其重要，於是工整的楷書應是最符合這樣的條件。因而唐代吏部選官時便有「楷法適美」的要求。至於唐代的楷書大師，無一不是朝廷的重臣或寵臣。如虞世南為盛德君子，褚遂良為託孤重臣，顏真卿為朝廷功臣，柳公權為朝廷寵臣等等。他們深受儒家正統思想影響，恪守為臣之道、篤志勤學、立朝剛直、風範凜然堪為一代名臣。故其書法方正有度、工於結體、法度森嚴，充滿廟堂之氣，尤以顏真卿、柳公權最為突出。

《新唐書》：「公權博貫經術，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莊周》書尤邃，每解一義，必數十百言<sup>54</sup>」。這裡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研習儒學之時，又同時研習《莊子》，且深得精神，悟得其理。柳公權同時從儒、佛、道中汲取心靈之滋養。他對於佛、道方面接觸頗多，可從其書法創作窺知。《金剛經》寫過多遍，見於《金石錄》著錄。另外公權還書有《陰符經序》、《清靜經》、《度人經》等和道家有關之書作。他對唐代僧人的碑誌、塔銘多有揮寫，如《大達法師玄秘塔銘》即為最著名者。柳於佛寺廟觀亦有書碑，有名者如《迴元觀鐘樓銘》、《復東林寺碑》，即此中佼佼者。柳公權在儒佛道學的浸染下，在紅塵中頗能超脫。富貴與我如浮雲，未把錢財看在眼裡。他給人寫碑，累計財富可觀、收入巨額，家奴海鷗與龍安常盜用其錢財器物，他都淡然處之。

### （四）技法理論深入之探討

由於書法藝術的發達，唐代的理論探討已由之前的泛泛而論，進而深入到用筆、結字、執筆的技法原理。如歐陽詢《傳授訣》、《三十六法》、虞世南《筆髓論》、《書旨述》、李世民《論書》、《筆法訣》、《指意》等，都是從理論上將書法藝術的創作實踐歸納出一系列美的客觀法則，尤其是把楷書這一中國書法藝術中最整齊、嚴謹的形式給予高度肯定。這種崇法的祈尚，大開了唐人楷書的風氣。像柳公權的用筆、結體、結字皆受以上書學者之影響。

<sup>53</sup>後晉·劉昫，《舊唐書·職官三》卷44，同上註，頁1892。

<sup>54</sup>宋歐陽修·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36卷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），2000年3月，頁3910。